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问题

(读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载一九六四年

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吕振羽

编者按：本刊发表的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同志的遗作《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些问题》一文，是作者蒙冤幽禁期间所写的“读报随笔”中的一篇。当时他手边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图书资料，唯一能见到的只有一两份报纸。这篇文章，就是从报纸上读到白寿彝同志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后，写下的关于我国史学史问题的一些重要的意见。吕振羽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后，原想对这些文稿进行整理，但因被摧残致疾，不幸逝世，计划未能实现。这篇文章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的，可看出这位老一辈史学家对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关心之切，亦可见他的风格和精神。今征得江明同志同意，特在本刊上发表。

一、中国史学史的编辑，即一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中国史学史的编辑，是一项很重大的而又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白寿彝、吴

泽等同志初步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已着手进行，是一件大好事。

我国历史时间很长，资料很丰富。从旧、新石器时代，即原始公社制时代开始，已有几十万年的历史；从最近发现的蓝田猿人化石（经周口店猿人以及资阳人、柳江人，马坝人、丁村人），已有六、七十万年的历史；从甲骨文开始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四千年；从历史著作的《国语》、《左传》等书算起，也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从这样那样观点论述和体例编撰的正史、稗史等史书，真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而不是历史编著，在诸子书或文集中表现历史观点的也很不少，对此，史学史研究都不能置之不顾。自然，我们的史学史应该而且必须是厚今薄古的；应该而且必须贯彻阶级观点的线索去揭发其发展规律。

因此，中国史学史研究编辑工作，确实是很艰巨的。以往地主、资产阶级的史家，除去一些所谓“书目”、“提要”之类，却没有留下什么更多更有用的成品，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史学史的科学研究和编辑。这一艰巨的工作任务，也只有在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和作出好的成绩来。

寿彝同志的文章提出不少重要问题和意见，而且其中有些意见我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不是说，文章已解决了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其编辑任务的全部问题。

二、寿彝同志的文章明白地肯定：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我认为这是没有争论余地的。又继续说：

在五四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国革命的浪潮不断地高涨，中国史学领域里表现为空前尖锐的斗争。在这里，理论上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对形而上学的斗争，跟政治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象一根红线一样鲜明地贯串着整个史学的发展。

这就是五四以来我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

五四以前，我们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史学史上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以与武断的历史观点相对立。在史学史上，当在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有反映新兴阶级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当同一性质社会内部出现阶段性变化时期也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跟反动的、落后的观点相对立的、革命的、进步的观点。

在阐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

这样的设想和提法，其若干基本论旨，我以为是对的。问题在于，解决中国史学史的具体研究的具体问题，似是还应更明确地、强调地抓最基本的线索。

历史上的所有历史著作，都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史学上的表现，为其所属阶级服务的；是各别阶级、阶层相互关系和斗争，即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在历史战线上的反映。

史学史是历史科学领域中专史研究的一种，因此，研究史学史的基本线索是阶级分析法。某些历史著作所包含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是在这个基础上与哲学史的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相适应的。这种观点和思想，反多出现在稗史、子书或文集中，而很少包含在所谓“正史”中。

我国史学史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以前的历史编著的历史观中，系统的唯物主义是没有的，完整的辩证观是没有的。在欧洲，即使在黑格尔，也是在“绝对精神”或普鲁士王国就停止发展了。从以往的历史著作中，指出其所包含唯物主义观点、朴素辩证法观点及其圆圈式的发展过程，察知其如何为历史唯物主义准备

条件,或以之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古代中世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近代的一切历史编著中,阶级性的表现,往往是较直接、较明显的,不象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反动资产阶级的历史编著那样转弯抹角,甚至以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的形式出现。所以他们对某些关涉到不同阶级利益较严重、较突出的问题上,往往较直接地表现其一定的阶级立场和论断——适应于一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例如:废井田、开阡陌问题,前汉限田问题,汉武“征西域”问题,王莽“变法”问题,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华北沦陷问题,唐代租庸调法与两税制问题,王安石变法和辽金和战问题,对待元朝统治的态度问题,清军入关与迎清反清问题,戊戌“变法”“维新”问题,等等。总之,不同史家对待那些历史问题的不同观点、论断,是起进步作用还是起保守反动作用?对人民、对民族生死、存亡、利害等关系问题的态度和观点如何?是站在爱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卖国的一边——或出之以暧昧、模糊?……凡此,都应结合当时的阶级构成、阶级关系和各自的不同要求进行分析。

三、历史过程,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在阶级社会时代则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围绕着错综复杂的次要矛盾,形成其不断发展变化或变革的过程以及新的过程的交替。历史和一切事象的发展、变化,表现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和瞬间。以往时代的历史家,不论其立场、观点、方法如何,都不能不接触、叙述那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历史事变和事象,只是有的在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基础上,构成其朴素的、零片的历史主义观点,有的则费尽心机地加以形而上学的歪曲……。那种较原始或朴素的历史主义观点,在我国中世的史学传统上是较丰富的,并有其多多少少的发展。

儒家的孔丘和其学派,也不能不看到所谓“夏礼”、“殷礼”、“周

礼”即夏、殷、周社会制度的不同及其相“因”的关系和所谓“朴”、“质”、“文”的变化。所谓继承孔丘《春秋》心传的左丘明，在其较原始的历史观点上，确实不同于孔丘，虽然他并没有超出孔丘的立场。白文谓：

《左传》在全书范围内展开了春秋时期社会矛盾的记述，视旧社会秩序的破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种估计是否过高了呢？白文揭出的论据是：“它传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的论点。”这确实反映了春秋时期历史变化的情况，也表现了左丘明的一些论点。在当时各国诸侯互相侵夺，强吞弱，大并小，各级领主相翦灭篡夺的社会情势面前，各国领主中也有不少人兴过类似的感慨。据记忆，如晋、鲁的卿、大夫中，就都有人说过这类话。因此论据似是还不够一些。寿彝又引左氏“同情齐国的权门陈氏，记述齐国人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同情鲁国的权门季氏，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见《左传》昭公三年和三十二年）。《左传》是凑巧了，它在这里同时表现了一种历史观点和一种进步的政治观点”。这是从春秋战国之际作为奴隶制与封建制界线的同志们共同常加引用的例证。为着说明春秋战国之际经过革命转变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便通过类此的史实来说明。不过，我总觉得，这类论据似乎不够有力。与其他两家共三分了鲁“公室”的季氏，田和以后的陈氏的齐国（为“七雄”之一）；我看他们与鲁“公室”或姜氏的齐国，同是封建领主，看不出他们有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举措。以著名的孟尝君来说，他和领地“薛”的关系，表现他是封建领主而不是“新兴地主”。自然，我在这里，也可能是偏执自己的旧看法。但我并不否认《左传》包含有进步观点。它的系年叙事，体现了一种随年月演进的历史线索（尽管它只是一些历史事象的敷陈），就是一大贡献。

春秋战国秦汉间，有不少个人论著，多多少少地涉及了所谓“变”的朴素的历史观，尤其在所谓“法家”的论著中；特别是《商君书》和《吕氏春秋》，还盖然性地把历史看作“上古”、“古代”、“当今”……等演进过程。他们中有些人还描绘了关于原始社会，即所谓“太古之世”、“上古”、“邃古”……的零片情况——我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曾极力搜集过，以之来论证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

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年来有些同志把他估价得过高了，忘记了他只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进步史家。但不容否认，他对我国中世史学的发展是起了不小作用，贡献相当大。他继承已往的各种编史体裁而加以创造发展，较全面地搜罗，较严肃地抉剔、处理了史料，编著成包括《本纪》、《世家》、《表》、《列传》、《书》等一百三十篇、五十万言的《史记》（其中《三皇五帝本纪》则系司马贞补入的）。最可贵的，他能朴素地或模糊地触到了人民对历史的作用，能注意并叙录了下层人民的活动及表现，如为陈涉立《世家》，叙述其对“亡秦”的作用，为“日者”、“游侠”立列传，抨击了项羽所至烧杀的暴行，汉代“外攘”“内兴”加于人民的繁重负担；而又朴素地盖然性地叙述了社会经济、物质生活对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重大作用。在论断中，他注入了无神论思想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尤其是他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方法；对由所谓“封建”到“郡县”，对社会经济等方面，贯注了朴素的“变”的观点。他的朴素的“厚今薄古”，反对“今不如古”观点，与其他有关观点、论旨统一起来考察，表现他已有了一种朴素模糊的进化观点。从班固的《汉书》到赵尔巽的《清史稿》，基本上都是沿袭《史记》的体裁……虽然大都有所损益，尤其是多篡改其积极的观点而代之以消极的观点。但他并没有接触到历史的规律性；对他以前的某些人已提出的“上

古”，“古代、“当今”及对原始社会的一些描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吸取，也没有应用到他的《表》、《书》等编述中去。

由其妹班昭等续完的八十万言的班固的《汉书》，基本上沿袭了《史记》的体例，只是不立《世家》，改《平准书》、《货殖列传》为《食货志》……；史料上也大部取自《史记》，——他们自己重新搜集的史料，工程是不小的，但后人对《汉书》史实丰富的赞扬也有太过的。最重要的，由于以大地主即豪贵地主阶级的立场代替了中小地主的立场，班固等人便割弃了《史记》的积极的进步的观点，而易之以在讖纬符瑞说基础上的五德相生的图讖说的神学史观，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观点替换《史记》的“变”的朴素的进化观点。这是极大的倒退。在《食货志》、《艺文志》等篇中，虽不能不叙述社会经济、学术思想的一些变化情况，却全归根于人的主观作用，为统治者抹粉，抹煞或毋视劳动人民的创造作用。所以《汉书》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至少是没有作出什么积极贡献。

全书共百多篇的范曄《后汉书》的大功绩，在于否定了班固《汉书》的神学史观，肯定无鬼、无佛，抨击“阴阳五行”的讖纬说等迷信说教，认为历史是变的，等等，恢复了司马迁的某些积极的进步的观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蔚宗以谋反诛”条说：“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邪。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膺）杜（密）。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卷六十一）。王鸣盛是从他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看的。但此，也有助于我们对范曄和《后汉书》的阶级面貌的理解。

司马光为首编纂的《资治通鉴》，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取舍上可能存在不小问题），进行了巨大、艰苦、认真的工作；编纂工作方面的严肃认真态度，也是可取的。它为我们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史料——虽然不能无条件地不加考辨地采用，同时也必然被他们割弃、淹没了不少史实。《通鉴》这种通史性的体裁，对历史人物、事

件、事变等等的叙述，那些史实本身不能不表现出一些发展、变化的迹象以至脉络；而贯穿于其中的司马光等人的观点，都是反对变的、保守的、没有发展的。这又是一大反动。

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通考》，分门分类的通史性的编纂体裁，而又可以从中看出各门各类相互关联的一些迹象以至脉络，这是一大贡献。他们又相继地继承了“变”的观点，并在某些方面作了一定的充实或发展，等等。这也是不可磨灭的功绩。

出生在资本主义已萌芽的时代的王夫之，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变”的历史观，而又第一次在中国史学史上提出了社会历史的进步论；尤其可贵的，他模糊地认为历史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即所谓“理”“势”；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揭发历史规律，只能触着其边际。

这里所说的，仅就寿彝同志文章的引证和自己过去阅读的印象，作为例子来说的，远非全部过程。我手边没有书籍作参考，记忆和印象可能与史实出入。

四、对于历史上每个人每个流派的史书编著，首先必须考察它对其时存在的反动的历史观点、论旨，采取什么态度，赞成、反对，还是调和。

同时，必须考察它，对于走向历史成为科学的进程中，作了些什么创造性的贡献，比前人多解决了些什么问题，新增添了些什么积极的科学的东西或因素。

还必须考察它对已往的遗产，前人的创造性成果，抱什么态度和作了什么，批判地继承、整理和加以发扬，还是加以歪曲、否认而走向落后、倒退。

对以往历史家和史书的编纂体裁，史料上的创造性经验、成就等等，凡有助于我们的历史科学的发展的技术性的贡献，也须予以适当考察，批判地继承。

对一切以往的历史著作，绝不为虚声和权威所惑，实事求是地

一一予以考察，剔除其糟粕性的东西，阐发其积极性的科学的因素，来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服务，亦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对史学史致力少，功力薄，寿彝同志的文章，对我有不少启发和帮助。阅读中，随笔写了一些想法。手边没有参考书籍，仅凭寿彝同志文章所引证及平日读书一些记忆和印象，可能讹误不少。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

我国戏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戏文概论》

钱南扬先生的新著《戏文概论》（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问世，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好评。

自一九二四年以来，作者研究南戏，努力不辍。先后发表了《宋元南戏考》（一九二九年），《宋元南戏百一录》（一九三四年），《宋元南戏辑佚》（一九五六年），《元本〈琵琶记〉校注》（一九六五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一九七九年）等许多有关南戏的论著。现在的《戏文概论》是在上述基础上更为精到、带有总结性的专著。共分十九章二十三节，约十八万字。关于戏文的名称、源委，剧本的存佚、内容和形式以及演唱等情况，都作了全面的论述。有助于读者对宋元明时期与杂剧、传奇鼎足而三的南戏，有较为清晰完整的认识。

前此，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论南戏渊源，虽有创获，但多缺漏。他在《曲录》中没有为南戏别立一目，且把宋元南戏误入明无名氏传奇之下。至于南戏的曲律等更略而不论。赵景深先生的《宋元南戏本事》（一九三四年），陆侃如、冯沅君先生的《南戏拾遗》，搜罗亦多，但偏重辑佚。如今的《戏文概论》，不仅取材极富，理清了宋元明南戏的一篇总帐，填上了我国戏曲史中“一个失去了的环节”，补正了前人的不足和失误，而且能以新的观点，注意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经济条件，论述南戏发生发展的史实，并对其代表作品如《琵琶记》等剧本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包括结构格律等），作深入具体的分析研究，力求避免简单和片面，因此论述比较允当翔实。足证这部力作，是作者数十年来专心致志精研南戏的结晶。它的问世，是对我国戏曲史研究的新的贡献。

·姚柯夫·